夏洛特·吉尔曼《黄色墙纸》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李 璐,徐志强

(1.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2.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作为女性批评家重新挖掘的早期女权主义文本,一直以来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价值和意义上存在着诸多争议。从叙事心理学角度探讨《黄色墙纸》中形成性别刻板形象的原因是性别角色期待的不同,而自我叙事的策略对女主人公疯癫的意识形态意义解读具有更切实的价值,填补了女权主义解读方式的空白。

关键词:性别刻板形象;角色期待;疯癫;自我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1-0063-04

夏洛特·佩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黄色墙纸》1892年初版时,女权主义运动还未盛行,人们仅把它当作一篇古怪的哥特式小说,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弥漫的那种近乎神经质的女性敏感氛围与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文风相悖,更是因为其类似意识流的叙述方式对于她所处的时代有太过先锋之嫌,而这些叙述风格主要源于其自我叙事的特征。吉尔曼最初创作目的是以自身精神疾患时的经历讽刺“休养疗法”的反面效果,文中的主人公与作者本身经历很大程度上重合,正如凯瑟琳·戈尔登(Catherine J. Golden)所评价“很难想象出除《黄色墙纸》外更容易与夏洛特·吉尔曼相连的作品”^[1]。同时,小说的自传式叙事和主人公、叙述者合一的叙述形式更提示了作品的自我叙事本质。尽管女权主义批评家重新发掘并定位了此小说在现代女权主义文学实践中的地位,叙事心理学作为对自我叙事的解读能更好地揭示《黄色墙纸》创作的女权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一、两性刻板形象与角色期待

女权主义批评更多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角度来认识《黄色墙纸》中主人公的从属地位和疯癫原因。作为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一书中探索了性别-经济关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和价值。她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共

同作用于对女性的经济和性的剥削,其结果导致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从属。在父权制下,“男性为婚姻和生育而选择那些符合通行的父权标准关于女子本性的伴侣”^[2],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人“是唯一的女性依靠男性取得食物的动物族群,唯一的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动物族群。”^[3]因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刻板形象被期待和创造出来了:她必须作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符合父权期待下的女性气质,忠实于丈夫,同时奉献于子女。更为重要的是,家庭以外的教育和职业从她的生活中被剥离出去,女性的角色只集中在家庭、孩子和婚姻上,她们在获得更高地位以及高度专业化职业上是受限制的^[4]。与之相反,男性的刻板形象被自然地塑造成孔武有力的强大的父亲形象:他能干,勇敢,权威,值得信任并依靠;从不犯错,也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他,他总是既正确又理智,他更能拥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父权体制下的两性刻板形象,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的不同的期待,从而导致男女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角色,按G·H·Mead的看法,是和一定的社会位置相联系的行为模式,即占有某一社会位置的人应有的行为表现,也即应尽的义务、享受的权利。角色规定了一个人活动的特定范围,即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中也包含人对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心理成份^[5]。女权主义视

收稿日期:2011-12-15

作者简介:李璐(1981-),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文学理论。

角中的两性刻板形象仅仅从表层解释故事内容中人物为何表现为读者所看到的形象,而角色理论则能从更深程度上揭示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背景下的性别权力机制和行为、心理模式。

吉尔曼所处的 19 世纪,仍是男权主导的性别阶级社会。与男性的统治地位相伴,女性始终从属于男性,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婚姻家庭权力关系上。女性在社会角色和道德规范的认识过程中渐渐形成社会所期待的女性气质和心理,具备与其特定的性别角色相适应的人格倾向和行为模式。同时,她们对性别角色规范中的权力机制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未能意识到女性自我的生存价值,主观上把自己的价值放在比男性更低的位置,认同或适应这种不平等的角色期待。

《黄色墙纸》中女主人公和其丈夫的角色关系体现了当时社会规范对男女行为和思维模式的期待,也暗含了父权社会对家庭内性别权力关系的界定。文中的女主人公同时是叙述者,讲述了自己接受休养疗法治疗精神紧张和抑郁而导致发疯的经历。主人公主要承担了两种角色:妻子和病人。主人公的丈夫约翰在作为丈夫角色的同时,担任了医生的重要角色。在父权社会中,丈夫/妻子的关系结构在家庭权力机制中是明显的对立关系,丈夫的统治权力代表了男权的社会规范,决定了妻子所应有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模式。妻子只能按照丈夫的期望采取符合自己特定角色的行动,即从属于夫权的妻子的角色扮演,从心理上适应这种社会角色的期待模式,即使在其中丧失自我。更为特别的是,在丈夫/妻子的角色关系中,医生/病人的角色贯彻始终。从叙述内容整体来看,《黄色墙纸》描写了一个女人的疯癫过程,因而医生/病人的角色关系更具有典型性。约翰作为丈夫和医生的双重角色,他表现了父权制下不容置疑的权威形象,甚至医生的职业身份更强化了他对主人公行为和思想控制的正当性。主人公身为妻子/病人的双重角色,随着丈夫/医生的男权压迫,产生了严重的角色冲突,最终导致其疯癫。作为妻子,她再三恳求丈夫移除令人生惧的墙纸,并希望走出房间,拥有正常的人际交流,但得到毫无意外的拒绝。作为病人,她多次试图和丈夫谈论病情,尤其在已经出现强烈臆想的情况下,但作为医生的丈夫总是回避承认其病情,把臆想症状“当作迷信一起的恐惧”,始终坚称妻子只是由于神经衰弱引发的敏感和多怒。因此,由于

约翰作为丈夫和医生的角色对她提出了矛盾的要求和回避,主人公无法协调妻子和病人的双重角色,发生了角色间冲突。起初她痛苦地控制自己以适应丈夫所代表的父权伦理价值,并努力相信丈夫的所作所为都是爱意和明智的行为。然而,她越努力地迎合父权社会的性别角色设定,就越感到紧张和沉重,尤其在她极力争取也不为家人理解的时候。这时,写作成为她的渴望,自我表达和从父权角色期待中解脱就是其需求。从此,她兴趣转向研究墙纸的式样,自我的形象和墙纸中的女人形象逐渐混乱融合,她最终疯了。

二、疯癫与自我叙事

在《黄色墙纸》的结尾,主人公疯癫后吓晕丈夫,并大笑着跨过丈夫。这一结局的意义一直是女权主义解读中争论的焦点。一些女权主义者解释为结尾尽管叙述者发疯但疯癫是种对男权抗争的胜利,从而摆脱婚姻的束缚,是对自由的追求^[7]。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失去理智的疯癫是对现实的挫败,因而叙述者从未赢得自由^[8]。究竟哪种解释更能反映作者创作的意图,主人公的疯癫是否更多地承担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吉尔曼自己对创作初衷的说明和自我叙事的文本解读可提供更切实的解读途径。

吉尔曼在“我为何写《黄色墙纸》”(1913)一文中说明了她创作的原因:1887 年她因患精神抑郁接受当时一位知名医生的“休养疗法”,即“尽可能呆在家里”,“一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脑力劳动”并“永远不再接触纸笔”。但 3 个月的治疗使她几近精神崩溃,直到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拾回工作的充实感,才逃脱疯癫的可能。为了庆祝自己回归正常生活,作者写下自白性质的《黄色墙纸》,并将副本送给那位医生,以讽刺其“休养疗法”的荒谬性。作者更强调此书对有相同疾患经历的女性病人的实践价值——摆脱“休养疗法”对康复的有效作用。

作者本人的阐述事实上说明了《黄色墙纸》作为自我叙事的特征,尽管吉尔曼同时也区分了纪实为主的文本中虚构和添加的情节(作者本人并未疯癫,也从没有对墙纸的幻觉)。作者在一段生活经历后把自己作为主人公讲述和回忆自己的故事,正是叙事心理学中的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 萨宾)。自我叙事强调当事人自己对生活故事的建构,叙事本身与建构自我息息相关,是

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9]。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即是通过叙说、修改来重构自己的过去,反思和体验个人的生命进程和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以获得个人认同和自我重构。同时,作者可以在写作中倾听自己,努力理解自己,是自己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是自己隐秘情感的宣泄,使认知、情绪和精神领域得到探索,并创造以前没有的东西:自信、自我价值、生活动机^[10]。吉尔曼承认《黄色墙纸》的自传性,将写作原因归为摆脱荒谬的“休养疗法”的欣喜和解脱感受,不惜将自己隐秘的精神病患详细地描述,在文中不无戏谑地直接指认主治医生的名字并在叙述结尾增添疯癫的情节,事后又公开将作品送给医生,毫无顾忌地讽刺其主治医生,已是一种解释自我,对自我价值和生活的勇敢肯定。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其自我叙事更是互动式的叙事,是寻求认同的尝试,隐含着作者对有同样经历的女性读者的指导和建议,正如她的保证“它(《黄色墙纸》)并不是有意使人发疯,而是拯救人们,避免疯癫。它也确实起了作用。”^{[6]834}

自我叙事的叙事心理学研究法也强调叙述过程中话语对建构自我的作用。自传式的叙事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自我探索方式。通过对自传式叙事的解读,不仅可以深入叙述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文化和社会世界。《黄色墙纸》中的叙述者以写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丈夫严密的控制和丈夫姐姐詹尼以照顾为名的监视中,这种写作只能是私下进行的最隐秘的自我述说。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又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证实为自我纾解而写作(“this is dead paper and a great relief to my mind”),作品也仅仅为自我而作。作品采用第一人称“I”,内聚焦贯穿始终,叙述者仅关注于自己的所思所为,其他角色的活动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也是叙述者的观察和揣测。语调中多次重复“人该怎么办?”(“What can one do?”, “What is one to do?”),“one”来有距离地指称自己,无奈地透露出自我反抗父权价值观的无力。同时,叙述者经常用大写单词来从语调上强调自己情绪和感受,在大写单词的17次使用中,以情节划分未发疯的前半部分用了PERHAPS, DOES, DELICIOUS, DRAUGHT, CANNOT, KNEW这6个,表现了主人公对丈夫高压微弱的质疑和对自己无力承担妻子、母亲角色的愧疚,其最初对疗养地的情绪也是乐观的(DELICIOUS)。

而逐渐疯癫的后半部分叙事则使用了BECAUSE, WILL, DID, LOOKING AT THE PAPER! COLOR, SMOOTH, DOES, ALIVE等11个大写单词,并结合大量感叹号,强烈地描述了自己对墙纸的兴趣,直接说明转向墙纸研究的原因,表达强烈的自我意愿和对丈夫及詹尼代表的父权压迫的防范,墙纸的颜色、污痕对她的影响直接投射到话语层。读者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她的情绪高度紧张,临近崩溃疯癫的边缘,但叙述者的态度转向自信,果断和勇敢,疯癫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和胜利。

墙中的女人,是《黄色墙纸》中最突出的意象。主人公起初痛恨墙中的女人对自己的诱惑,意图拴住墙中的女人,表现了她认同丈夫对此的权威解释,排斥所谓的“幻觉”,极力想回到丈夫和医生要求的规范。渐渐地,墙中的女人形象愈来愈鲜明,爬行和挣脱墙纸束缚的举动得到主人公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自豪地承认了“我白天通常是锁着门爬的!”最终这种认同发展为主动将自我的形象与墙中的女人的形象融合为一体,有了既帮助墙中的女人挣脱墙纸的空间束缚又摆脱丈夫和医生强权禁锢的冲动。情节的高潮也正在于结尾部分惊呆丈夫并跨越他的举动,主人公有策略地拒绝约翰进入房间,欣赏自己无拘束爬行的乐趣,嘲讽丈夫的无奈和晕倒。她不仅承认自己是墙中的女人,还认同墙中有一群相同境遇的女人,更强烈表达了自己的爬行是自由之路,而丈夫是路中的障碍。吉尔曼曾经在“障碍”一诗中描述了相同的情景“我直直地越过他/好像他不在那里”^{[11]40}作者将诗名定为“障碍”,并在小说结尾运用相同的意象,已经很清晰地说明了作品的反男权色彩,因此结尾的疯癫在作者的观念中并非挫败和失望,而是胜利的号角和指引。

1880年,卡罗尔·斯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 Rosenberg)指出,女人很可能压抑而不是表达她的愤怒,她要是表达了愤怒,就可能会被认为了疯了而被送至收容所,这很可能只会导致她更深的疯癫。理想的女性应该是安静的:“好”女孩,她不会惹麻烦,也不引人注意或求人帮助,而是满足于用自己的方式发泄,通常是无声地、私下地、邪恶地^[11]。《黄色墙纸》颠覆了这一19世纪的理想女性形象,从反面塑造了无畏的疯女人的典型形象。主人公的疯癫,体现了她追求自由、平等地自我表达的主题。虽受父权规范约束,被剥

夺了生活空间的自由,也从未得到姐妹情谊的支持,主人公仍顽强地写作,从私下的创作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女性存在的价值。表面的失语和持续的写作最终爆发为疯癫后对男权无畏的反抗。疯癫,既是她长期暗地里追求的自由的极端化表达,又是她想要逃避父权社会压迫的心灵解放的结果。

海伦·希克斯(Helene Cixous)在其著名的宣

言“美杜莎的笑声”中,曾提出正是迷信使美杜莎——女性知识分子、作家或批评家的代表,变成了神话中使男人化为石的妖魔。“如果你直看着她,你看到她很美丽,她在大笑。”^[12]美杜莎沉睡在每个知识女性的无意识中,一旦唤醒,她令人心颤的魅力将使镇压者无法攻克。尽管她疯了,《黄色墙纸》的主人公,作为美杜莎的继承者,也同样的美丽,在爬过男权之路上也大笑而过。

参考文献:

- [1] Golden, Catherine.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 Sourcebook and Critical Ed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2] Madsen, Deborah. 女权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41.
- [3] Perkins Gilman, Charlotte. *Women and Economics*[M]. New York:Cosimo, 2007:3.
- [4] 林美如. 从性别角色理论分析女性的“灰姑娘情节”[J]. 青年探索,2009(3):44-47.
- [5] 倪天强. 社会学“角色理论”给我们的启示[J]. 上海精神医学,1985(2):65-69.
- [6] Perkins Gilman, Charlotte. *The Yellow Wallpaper*[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6th edition, Volume C.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832-844.
- [7] Hochman, Barbara. *The Reading Habit and "The Yellow Wallpaper"*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89-110.
- [8] 沈艳燕. 《黄色墙纸》的女性主义解读[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3(27):11-14.
- [9] 马一波,钟华. 叙事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93.
- [10] 施铁如. 叙事心理学的追求[J]. 全球教育展望,2006(7):44-47.
- [11] 黄芳. 从禁锢到解放——从女性主义解读《黄色墙纸》[D]. 苏州:苏州大学,2008:28.
- [12] Showalter, Elaine. 她们自己的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335.

A Narrativ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Charlotte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LI Jun¹, XU Zhi-qia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03,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Disputes always exist on the ideolog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arlotte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since it has been revalued by feminist critics as the early feminist tex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 of opposed sexual stereotypes in *The Yellow Wallpaper* lies in the different social gender expectations and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self-narrative as a narrative strategy appli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of the insanity of the heroine.

Keywords: sexual stereotypes; role expectation; insanity; self-narrative

(责任编辑:李开玲)